

之間的矛盾，講道理不能這樣講。現在矛盾，將來也還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為國營農場發薪水的時候，也還是有矛盾的。社會主義由兩部分組成：公有制、集体制，將來二者也要發生矛盾。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基本適合，也有不完全適合的地方，還有缺點，講完全適合不對。斯大林提完全適合，就出了問題（報告第十四頁）。宗教這種意識形態就不適合社會主義，但是還要修廟，修廟是为了達到毀廟的目的。為什麼說大體適合呢？因為可以發展生產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萬噸鋼，我們增加四百萬噸。我們的制度不阻礙生產力發展。几十年後集體與國營的矛盾解決了，還會有新的矛盾。到共產主義，價值法則不要了，軍隊不要了，當然也要國際環境許可。八大決議這句話，馬、恩、列沒講過，但也沒有害處。意思是趕快發展生產，充實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只是沒有講清楚，帶語病的性質，沒有認真的講清矛盾，是比外國、比將來，這句話現在也不必改，現在可不談這個問題。列寧講過蘇維埃政權與落后的技術有矛盾，現在不講，以後解釋清楚就行了。嚴格地講，說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不适合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恰好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生產力。許多經濟學家說我們的制度與生產力有矛盾，說社會主義制度落後於生產力，這種說法不好。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鳴，大放，

大爭，大辯，大字報，這一套。在羣眾中間創造了这么一個方式。這個方式跟歷史上有所區別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風，也有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點怕。後頭有一個三查三整。三查是查歷史，查工作，查思想，三整是整什麼我忘記了。那個時候我們新華社社長范長江就下了台，整了他兩個月，然後才翻身。因為發動了羣眾，三反中間有多少個部長下不了樓，後頭我們擺了梯子才接下來。從前軍隊里頭，在戰爭時期，依靠戰士們，依靠當地人民，沒有那個地方發餉，沒有那個製造槍炮的工廠，就只好依靠羣眾，所以長期以來，軍隊、地方都形成一種民主作风。但是那個時候，整個革命時期，就沒有現在這個大放，大鳴，大爭，大辯，大字報。三反五反沒有搞大字報，三查三整沒有大字報。再上去，延安那個時候出了一點大字報，我們也沒有提倡，這是什麼理由？我想或者是我這些人那個時候蠢一點吧？恐怕還有客觀原因，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打仗，階級鬥爭那麼尖銳，內部又這麼大吵，那就不好了。現在就不同了，那樣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基本上結束了，全國和平了，所以才出現了这样一个東西，找到了这么一個形式。這種革命的內容，它要找到這種形式的。現在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為了建設。而一找到了這種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雖然有幾怕，主要是兩怕：一個就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你們膽子那麼大？我就不那麼十分相信。因為我們有許多人也是怕亂的，你說我一點也不怕亂呀？各民主黨派是不是也有一點怕亂？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台。當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這一放出來，火一燒，怎麼

下台呀！現在好說了，比如在五月間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說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專學校，开了多少會才放开。北京大学的羅隆基算是願意放的，也开了多少會。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还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还是大鳴大放。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了台。除开個別的人，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比如馮雪峯，他是一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黨。馮雪峯是個共產黨。其他的人就不要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羣眾的多數？要相信人民中間的多數人是好人。應該講，工人多數人是好人，農民多數人是好人，資本家多數是可以改造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成員，共產黨，青年團，應該相信多數，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的。所謂多數，究竟什么叫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就叫多數呢？不是這個數目，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現在全國，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這個事，什麼人都是生的，我們都是生手。我們過去只是搞好民主革命，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不破壞個體所有制，不破壞資本主義所有制，但是破壞封建階級所有制，買辦階級（蔣、宋、孔、陳那套人）所有制。所以有許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可以过来。有一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熱心，但是他可以过来。有一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麼一個雇农叫劉介梅，報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飯，後來翻身了，發起來了，現在當了區長一級的干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這個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化，要搞

“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他開了展覽會，痛哭了，要求不要開除黨籍，願意改。他是湖北黃岡縣的，在那個縣里開個展覽會，他就當指導員。分兩個階段，要飯的階段，同後头发起来的阶段。象那样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開除黨籍，因為他願意改嘛。民主革命可以过关，而社會主義這個关就有些人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關，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當然，這個鬥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時候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大體上我看要三個五年計劃或者還多一點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五年計劃，還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這一年是一個高峯。以後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洪峯？象每年七、八月，八、九月間，黃河的洪峯要來。以後這十五年是不是年年要來洪峯，你們水利部要筑堤，（笑聲）我看恐怕不是那样，這個峯越搞越小。六億人口中間，出了十幾萬右派，也是很少。我說全國人民中間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贊成社會主義，他們許多同志摸了這個底，有人說百分之十五，有人說沒有百分之十，只有百分之几。大概百分之十可靠。對於社會主義，按他本心是不贊成的，這包括地主階級、富農、一部分資產階級、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部分城市的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的貧農、下中農、工人，剛才講的劉介梅這樣的人。六億人口中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有六千萬。這個數目不少，不要把他看小了。在這上頭，我們就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我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贊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有廣大的同盟軍。第一個同盟軍是在農村，有貧農、下中農和一部分富裕中農。剛才講，有人說百分之十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插話：是中農里邊的百分之十五），

我是講全國人口，我跟一些省委書記摸了这样一个底。但是所謂堅決分子，包括極右派、反革命，搞破壞的，還有不搞破壞的，很堅決的，可能要帶到棺材里去的，他就不改，什麼社會主義，他不聽，月亮還是美國的好，中國的月亮差一點。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剛才你（指×××）講了，三百萬人里頭的比例是百分之二點二。全國人口里頭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萬。一千二萬如果集合起來，那是个很大的軍隊，如果他手里拿了槍，那是一千二萬的軍隊。但是為什麼天下不會大亂？因為它是分散在這一個合作社，那一個合作社，這一個農村，那一個農村，這一個工廠，那一個工廠，這一個學校，那一個學校，這一個共產黨支部，那一個共產黨支部，這個共青團支部，那個共青團支部，這個民主黨派的支部，那個民主黨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處，他不能集合。所以我們的基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贊成，包括無產階級，農村里頭的半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我們把地主同買辦這兩個階級不算，那兩個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對象。我們不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嗎？帝國主義在國外，現在我們已經趕走它了。在國內就有一個封建主義、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同買辦階級，那是一個革命對象。這一個革命是在一個什麼範圍之內呢？是一些什麼階級發生鬥爭呢？就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這樣三個階級。

無產階級數目很小，但是他有小資產階級的廣大同盟軍，就是貧農、下中農。貧農是半無產階級，下中農是中農，是有產，但他是比較苦的。這個數量，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

七十或者還要多一點。富裕中農大體占百分之二十。現在富裕中農大體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贊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動搖的、兩可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對的占百分之廿。地主也有分化，地主現在不完全反對社會主義，因為這幾年來的教育，出來了一部分不鬧糧食、贊成統購統銷、贊成合作化的地主，富農也出來了一部分。不要以為現在地主都是反對社會主義，富農都是反對社會主義，資本家都是反對社會主義，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反對社會主義。事實不是那樣，要加以分析，這裏面堅決分子是大概百分之二，所以我們就要相信多數。你看，百分九十九嘛！經過工作，經過大辯論，還可以爭取百分之八，就變成百分之九十八，那個堅決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當然要注意，剛才×××同志講了，他還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呀。地主更沒有威信。買辦資產階級是喪失了威信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城市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一些比較富裕的小业主）同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就有威信了。比如農村的富裕中農是有威信的，因為富裕中農生產是比較強的，貧農趕不上它。至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國這個知識分子吃得開，不是說過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財富嗎？的確是，你哪一樣都是缺不了他，沒有他，不能開學校，教授離不了他，中學小學教員離不了他，辦報紙要新聞記者，唱戲要有演員，要有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這個階級人數不多，几百萬人，連他的家有幾千萬人，大概有三千萬人。聽說真正的資本家七十萬，不包括家屬。知識分子可能有四、五百万，我說一共打他六百万，五口之家（因為他們比較富裕，生兒育女比較多），五

六就是三千万。这个阶级比較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翹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講过嗎？无产阶级的小知識分子就領導不了資產阶级的大知識分子。他自己一定要說他是小資產阶级，說他是小資產阶级的大知識分子。我看来，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識分子，就是无产阶级，大字也不知道几个，就比罗隆基高明。資產阶级同資產阶级知識分子，上层小資產阶级同他們的知识分子，包括中間派，他們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是不服气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实际上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但是这里头就要分析了：右派是对立的，非右派是半服半不服。不是講这样也不能領導，那也不能領導嗎？不仅是右派有这个思想，別人也有。总而言之，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就非搬外国去不可，无产阶级非上月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講哪一行，他都說你不行。我說經過这一次辯論，主要目的，就是爭取半服半不服的，使他們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規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那个文化不高明的无产阶级的話，在农村里头要听貧农、下中农的話。講文化，講本領，貧农不如富裕中农，但是講革命，就是他們行。这可以不可以說服多数人？可以說服多数人，多数人完全可以說服。資產阶级的多数，上层小資產阶级的多数，我剛才講，富裕中农只有百分之四十是贊成合作化，有百分之四十是动摇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不贊成的。这个动摇的就可以說服他。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員、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这许多人，多数人都可以說服的。用說服的方法，不大服气，慢慢他就会服气。我看还要过若干年，大概过十年。比如对苏联总是不服气，現在放出一个

“月亮”来，好象又有点行了。（笑声）在苏联也是經過这个阶段的，說共产党不行，这样不能領導，那样不能領導。現在他們早已解决了，革命四十年了，我們还只有八年，所以难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所以我們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只要不是馮雪峯、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可以下台嘛，无非是三大民主，有則改之。

在这个基础上，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在这个时候出現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沒有阶级性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大鳴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鳴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报。我說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发明的。鳴放是我們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並沒有講什么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沒有这个“大”字。去年×××有一篇文章，我們去年五月在这里講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爭鳴，那是一个鳴，就是沒有那个“大”，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叫鳴放，叫作鳴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这个口号右派也可以用，中間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結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归根結底对右派不利。問題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这样大鳴大放的口号，大字报、大鳴、大放、大辯論这样的方法和方法，归根結底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兩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資本主义，归根結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

說，等于演話劇一样。从前抗日时期，北方有个新民会，是那个繆斌在这里搞的。繆斌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改組派。繆斌他后头当汉奸了，搞新民会了，他們搞話劇，報上登了，去太原演話劇，來贊揚日本的皇軍，反对中国人。那么因为汉奸演了話劇，我們就不演了吗？我們还是要演。还有旧詩，黃老你是專家，这个东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写的那几首詩里有什么“××××乱橫行”，什么东西，他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那个时候我也說，这种人不要十分去追究他，那个时候他那种思想，就是要写一点詩罵人。我也很賞識他那几首詩（笑声），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当然，右派是下不了台，但还是可以下台的，右派总要下台吧。下台，按照辯証法，我看是一分为二，兩點論，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永远戴下去呀？从此不得翻身呀？我看不一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轉好了，比較老实，比較不十分頑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許有个別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总理：劳动改造）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現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听说她愿意干那个事。那种人，娃娃，二十八岁了，也不娃娃了。自己撒謊說只有二十一岁，确实有二十八岁了。进青年团进不了，她就不高兴。現在孤立起来了，在学校里做点工作，劳动改造。那是個別的人。但是你要費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吳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的知識分

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現在我們的干部許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將來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沒有做过工，沒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們，要你黃炎老、陳垣先生、張文伯都下去做苦工，（黃炎培：家里头做做也可以）古人不是說：“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嗎？（笑声）这些話我們过去都說過，當然沒有現在說得这么透，尤其沒有摸这个底。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一下底，一方面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用我們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样的事件。波蘭這個問題還沒有解决的。他要封一个報紙，我們不需要封報紙，我們只一篇社論就行了。《文汇报》写了兩篇社論，头一篇不彻底，沒有講透，第二篇社論就自己攻。《新民晚报》是自己攻。赵××跟我談的时候，我說，你搞得很好。他說实在是犯了錯誤。我說，你犯了錯誤，你改了，就行了。《新民晚报》很小一个报，你們都不看的？这个報紙值得一看。在波蘭不行，他要封一个報紙，封这个報紙，就惹起事來了，不曉得這兩天結果如何？（总理：還沒有完）他那個問題，总而言之，還沒有解决，他是反革命沒有解决，右派問題沒有解决，資產階級思想、兩條道路的問題沒有解决。

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識分子。你們各位听了是不是吓一跳？因为你們許多人又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識分子。无产阶级虽然少，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現在是一千二百万，八年以来增加了八百万。不要看这么少一点人，

只有这个阶级才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全部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場。至于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是过渡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要了，这个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識分子，可以慢慢变的。我在四月三十日就講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然就有作樑上君子的危險。那一次主要問題是講這個問題，講阶级起变化。这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現在许多人进了工会，說进了工会岂不是变成工人阶级了吗？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馮雪峯不是共产党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了。学校里的教职员都进了工会，錢偉長不是工会会员嗎？錢端升不是工会会员嗎？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賞識他們。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們改造一下？比如費孝通，我跟他談过，我說，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笑声）他学了我們土改里扎根串联的办法，他一共有兩百多个高級知識分子的朋友，什么北京、成都、武汉、上海、无锡各地都有，他說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他在那圈子里就出不来，他不仅出不来，他有意識組織这些人，代表他們大鳴大放。我說，你不要搞那二百个，另找二百个，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二百个。他說不曉得还要不要我。我說，你不講去調查嗎？你再可以去調查，你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上去調查，誰人不要你呢。这是我在六月初跟他談的。所以有几个右派朋友是好，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了解了解他們的心理状态，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都要有朋友，工人要有朋友，农民要有朋友，現在民主党派都要有朋友。

派，大学教授，文学界，許多共产党的作家他沒有工人的朋友，沒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一个缺点，我要到那里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个地方。在农民中你不要輕易去找富裕中农当朋友，那个刘介海你不要找他当朋友，他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找貧农、下中农，找老工人。老工人他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貧农、下中农容易辨别方向。所以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从来不悲观的。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不是談了吗？乱不了。不是講不怕乱嗎？亂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师范大学鬼叫一个时候，天下大乱，我看事情就好办了。

整风准备有四个阶段，剛才鄧××同志也談了一下，就是一个大鳴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风，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字，檢查思想，学点馬列主义，和风細雨，开小组会，搞点批評自我批評。五月一号整风文件講和风細雨，許多人不贊成，要來一个急风暴雨，結果很有用处。这一点，我們当时也估計到了，因为我們延安那一次整风是那样，你講和风細雨，結果要來急风暴雨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归結到和风細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貼，貼几千条，那个工厂当局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車間主任就想辞职，說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們說，你們不能駁，只能他們鳴放。我們那时候也對他們講，要讓他們講，不要駁，所以，五月我們不駁，在六月八号以前，我們一概不駁，充分鳴放出来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鳴放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就是右派言論。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恐怕你們各民主党派現在也有了經驗了，每个單位要經過这么一个阶段。每一个合作

社，每个工厂，現在军队也是这样搞。明年搞不搞，明年再定，我們再商量，因为明年搞到五一，下半年再来搞一次，是不是有这么必要，但是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場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是那么怪的，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員，新聞記者，工程师，科学界里头又要出許多怪議論，資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等于我們扫地一样，这个房子最好每天扫，我們洗脸一天总要洗一回，以后我看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只个把月就行了，不会有現在这样的高峯，也許那时候要来一点洪峯。这个洪峯不是我們造成的，有些东西我們沒有估計到。我們不是講过嗎？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崗，你們民主党派一个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信。現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馮雪峯、江丰这么一些人。

整风的四个阶段，一个是放，一个是反，一个是改，一个学。这样四个阶段，大概还要搞几个月。

要承認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認有改造的必要，他們不承認还要改造，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說我們已經改造好了。章乃器說，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你說要脫胎換骨，他說脫胎換骨会抽筋剥皮。我們中國許多人都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搞。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知識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識分子。这些老知識分子将来还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識分子起来了。什么助教、講师，他将来总有一天当教授，你講学问，你說他現在不行，他将来也可以行的。工程师、科学家、新的人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員將

了一軍，非得前进不可。我們估計，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識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知識分子。无产阶级必須造成自己的知識分子队伍，跟资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知識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它沒有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沒有那样一些知識分子，他资产阶级專政怎么能行？无产阶级專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識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論，把这个問題講清楚。右派中間那些不变的，不愿意脱胎换骨的，大概章乃器就不要算，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变好了，說是紅色资产阶级。我們說你还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他在这个时候不紅，他要到将来再紅，这个时候不紅，你是什么顏色呀，你还不是白色？要同时是紅的，又是專的。要紅起来也很容易，并不困难，你就下一个决心，并不要讀很多書，主要是着重在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專政，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們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們不懂这个，我在四月三十号講的那些，他們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說中国有五張皮，旧的有三張，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資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識分子就靠这三張皮吃飯。此外还靠民族資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們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張皮而已，从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兩張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張皮現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張久已不存，新皮兩張也不存了，現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兩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

体所有制。現在靠誰吃飯？民主党派也好，大學教授也好，科學家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飯，吃集體農民的飯，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總起來是吃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飯，吃公有制的飯。那個皮沒有了，這個毛呢？現在就在天上飛，落下來也不扎实。他還看不起這個皮，什麼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這個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那個時候（四月三十日）我就勸大家，我打了一個比喻，我說這個事情不容易，比如吃狗肉，我就有這個經驗。從小不吃狗肉，我又沒有吃过，但是我就反對吃狗肉。你沒有吃过，為什麼反對呀？你沒有經驗嘛！你說狗肉不好吃，你吃过沒有呀？你何以見得狗肉不好吃呀？你吃都沒有吃过你却到處發表意見，說狗肉不好吃，並且把狗肉送到你面前，你聞一聞就跑，這是因為社會上的輿論历来就这么講。狗肉古人是大吃特吃的，孟夫子的經濟綱領就有一條：養狗。他說：“鷄豚狗彘之富，無失其時，七十可食其肉矣。”七十歲的人才可以吃肉，六十九歲不行，因為那個時候生產力很弱，只有那麼多東西。馬克思主義，因為過去反對的多，帝國主義反對，蔣委員長天天反，害得大家生怕這個東西。有一句話說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就是說狗肉不適合人民需要。這要一個過程，而且要有个運動。今年這個運動，就是開辟這條道路。

現在有些機關、學校，右派反過之後，風平浪靜，提出的許多意見就不肯改了。你看又要來一個鳴放高潮，把大字報貼一貼，將一軍，這個將軍很有作用。要改，要有一個短時期，比如一兩個月。要學，這個學，當然不是一兩個月

了，只是講這個運動告一個段落。這個，右派估計到了，他說，這個風潮總要過去就是了。很正確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較不那麼濃厚了，因為反的差不多了，不過沒有完結就是了。不要松勁。有些人死不投降，象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將來還說服他，說幾次，他一定不服，你還天天開會呀？擺到那裡，聽他怎麼辦。我們採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剝奪他的選舉權的辦法，對於這些人，給他們一個轉彎的余地，分化他。那麼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怎麼辦呢？那就也就算了，他數很少，擺到那裡，擺他幾十年。多數人要向前进，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了，我們這個國家的面貌會有改變的。

現在我講農業綱要四十條。經過兩年的實踐，基本還是那個目的，就是四、五、八，就是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達到這個目的，這是基本之點，整個綱要基本上都沒有改，但是有些東西改了，譬如有些東西已經解決了，合作化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還有，這個條文次序都有些改。還有，過去有些沒有強調的，譬如機器、化學肥料這兩個東西，過去沒有強調，現在要大搞，要加以強調。過幾天開一次人大常委同政協常委的聯席會議，討論一下，討論後就可以登報，拿到整個農村中去討論，工廠也可以討論，各界、各民主黨派也可以討論。今年冬天或者十二月什麼時候共產黨要開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再通過。這是共產黨提出的，這是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東西，就不是章伯鈞的那個政治設計院。共產黨要提到國務院，國務院再提到人民代表大會。今年冬天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開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早一點通過明年的計劃和預

算。过去我們不是总搞在五六月嗎？現在要改一下，要提早。同时把农业綱要在那个时候通过。发动全体农民討論这个綱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勁来。現在已經开始有勁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开始泄了勁，現在整风又把这个勁鼓起来来了。我向同志們說这四十条以及工业計劃，文教計劃，完全有希望，比較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这里头有些主观主义的，我們改掉就是了。比如农业綱要四十条里头有一个六百万双鐸犁，这是个主观主义的，我們现在把它去掉了。此外还有些修改，經過兩年的实践嘛！但是总的說是有希望的。我們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識可以改造得有知識，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綱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不曉得諸位如何？恐怕你們也是有兴趣的吧！有人說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爭食。一方面它可以吃虫，但他也吃糧食。老鼠就沒有人贊成它，还有蒼蠅、蚊子，是沒有人贊成的，名譽不好。現在北京的蒼蠅蚊子不很多，但是又有了。过去沒有搞蚊子，專搞蒼蠅麻雀了。这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把这几样东西也搞掉是不容易的。如果动员全国人民来搞，我看我們这个民族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我們要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三个五年計劃搞到兩千万吨鋼，再有十年就可以了。今年就是五百二十万吨，我們五年增加三百多万吨。拿一九四九年算，只有十几万吨，恢复的三年（一九五〇、五一、五二）就搞了一百多万吨，現在又搞了五年，就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可以达

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計劃，是不是可以达到兩千万吨？跟打麻將一样，加它一番。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試點，大概要三年試點，五年突击，兩年扫尾。十二年已經过去了兩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方面搞出一点成績来，人民的心里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試點，几年突击，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經过大辯論。

除四害要大搞大鳴、大放、大爭、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得了灭不了蒼蠅、蚊子、老鼠？我說我們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他們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是不想搞这个事，那就当然沒有信心。我們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計劃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計劃，还有工业計劃，还有文教計劃。

至于是不是把右派分子丟到海里头去呢？我們一个也不丟。不是剛才講了兩种人了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取消，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一直到見閻王。他說我是不投降的，閻王爷你看我是多么有骨气呀！這是資產阶级的忠臣，他不投降。右派是跟封建殘余有联系的，通气的，他們并沒有通信，沒有开什么会，但是彼此呼应。那个文汇报，地主非常高兴，地主就买了报，对农民讀，你看报上載了的呀！他們就想倒算。所以封建殘余，反革命殘余跟右派，他們实际上是通气的，还有外国跟中国也是通气

的。比如台灣、香港对儲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的。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拥护的，还有葛佩琦，最出名了。还有美国，他們很不贊成我們反右派，很同情右派。我曾經跟各位也講过的，我說假如美国人打倒北京，你們怎麽办？採取什么态度？你們怎样做准备？还是跟它一起組織維持会？还是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維持会，第二步就到延安。我不是在二月二十九号的前兩天談过口，然佔領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佔領了大半个中国嗎？然后不是搞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嗎？我們說感謝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談过，我說你們这个侵略对于我們很有好处，你們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們，提高了觉悟。

此外还有几个文件，就是劳动工資，体制問題，这些会要跟大家商量的，要提到人大常委。还有一个工資同劳保福利，这个也要商量的，恐怕先还要去試驗一下，作为草案有利，工厂里头搞一个試点，然后才能够作决定。

右派不講老實話，我們講老實話。他不老实，他瞞着我們搞一些事情。誰曉得張伯鈞搞那么多事情，这种人我看官表如何安排？右派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工作总是要有一点工作，人民代表恐怕难安排了。丁玲是不是作。这些著名的右派，人民代表恐怕不能选。明年要选举了，明年选举选人民代表呀？人民代表不能选。还要跟各位商量选举的名单。有些人，你一点职务也不要恐怕也不好。对右派的安排也是个問題，要好好考慮一下。有些教授，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当不成了。

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別的工作，讓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当教授。这些問題都要考慮，是一个麻煩問題。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煩事情。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們这些人也不摸底，等于我們对于許多地方不摸底一样。这一次，百分之二的坚决的右翼分子，可以在一个时候把水搞得很渾，使我們看不見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見了底。这个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鳴、大放、大辯論之后，就看見底了。农村看得見底，工厂看得見底，学校、党、团、民主党派，这些都有底。章乃器这些人，你要長期共存，他是短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是不相监督。章罗联盟，对長期共存这个口号最高兴了。一个長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爭鳴，他們最喜欢了，結果就走到反面：長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对右派的處理問題，請諸位去考慮一下，議一下，如何处理法。

今天是个通知性質的會議。請大家回去研究一下：整风問題，农业綱要。农业綱要会发給大家的。

在南宁會議上的講話

(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兩年沒有看了（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国务院只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

的。比如台灣、香港对儲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拥护的，还有葛佩琦，最出名了。还有美国，他們很不贊成我們反右派，很同情右派。我曾經跟各位也講过的，我說假如美国人打倒北京，你們怎麼办？採取什么态度？你們怎样做准备？还是跟它一起組織維持会？还是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我不是在二月二十九号的前兩天談过那个話么？說这个話，是极而言之，把問題講透不怕乱。你佔領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佔領了大半个中国嗎？然后不是搞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嗎？我們說感謝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談过，我說你們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你們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們，提高了觉悟。

此外还有几个文件，就是劳动工資，体制問題，这些会要跟大家商量的，要提到人大常委。还有一个工資同劳保福利，这个也要商量的，恐怕先还要去試驗一下，作为草案在工厂里头搞一个試点，然后才能够作决定。

右派不講老实話，我們講老实話。他不老实，他瞞着我們搞一些事情。誰曉得張伯鈞搞那么多事情，这种人我看官越做越高，反就越造得大。部長怎么样呀？部長恐怕也当不成了吧？右派当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还有一个人民代表如何安排？右派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工作总是要有一点工作。这些著名的右派，人民代表恐怕难安排了。丁玲是不是选人民代表呀？人民代表不能选。明年要选举了，明年选举还要跟各位商量选举的名单。有些人，你一点职务也不要恐怕也不好。对右派的安排也是个問題，要好好考慮一下。有些教授，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長当不成了。

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別的工作，讓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当教授。这些問題都要考慮，是一个麻煩問題。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煩事情。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們这些人也不摸底，等于我們对于許多地方不摸底一样。这一次，百分之二的坚决的右翼分子，可以在一个时候把水搞得很渾，使我們看不見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見了底。这个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鳴、大放、大辯論之后，就看見底了。农村看得見底，工厂看得見底，学校、党、团、民主党派，这些都有底。章乃器这些人，你要長期共存，他是短期共存；互相監督，他是不相監督。章罗联盟，对長期共存这个口号最高兴了。一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爭鳴，他們最喜欢了，結果就走到反面：長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对右派的處理問題，請諸位去考慮一下，議一下，如何處理法。

今天是个通知性質的會議。請大家回去研究一下：整风問題，农业綱要。农业綱要会发給大家的。

在南宁會議上的講話

(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兩年沒有看了（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国务院只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資產阶级的政治設計

院，我們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給成品，不給材料。要离开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談，說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则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辭問題，后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險是“紅而不專”，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專也慢慢退色了。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虛業”結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点“实业”。紅安縣搞實驗田的報告是一個极重要的文件，我讀了兩遍，請你們都讀一遍。紅安報告中所說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帶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領導。这一点不解决，批評別人專而不紅，就沒有力氣。党委領導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試驗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紅了，鑽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講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詞好不好？这是政治問題。一

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兩只手來給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瘡。“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講一个指头長了瘡，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綱要，三为促進委員會。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庫空如洗”，“市場緊張”，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嗎？

十个指头問題要搞清楚，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还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勁、乘风破浪，还是潑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張奚若（未划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將來。”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积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万吨鋼，我們不輕視过去、迷信將來，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資產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問題。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們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銘樞。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資產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問題，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們除四害，把蒼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論，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陈伯达插話說，應該多积累。）

減少人員問題。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說了几年了，他們不改，交給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進北京，三輪車一輛也不能減。我們的“聖旨”太多了，無考慮余地。你說可以考慮，我也高興一點。我們的現狀維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學，如“蔣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鈞要搞資產階級設計院。我們設計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報，不帶本子，講講方針。搞個協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經兩年不看了，地方財政部門也採取這個办法。

這幾年反分散主義，創造了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權，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

政法機關有些人提出，說是黨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這不行。先不分，然後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權獨攬，如四十條綱要怎麼分？中央二十條，農業二十條？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條，然後分工去辦，這就是分。憲法，不能中央搞一個，由什麼機關搞一個。小權小分，大權就不能獨攬。大家不是贊成集體領導嗎？一長制不是搞倒了嗎？（蘇聯軍隊實行一長制，朱可夫犯了錯誤。）

（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 years來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鬥，我說了一千次，一万次，這是極而言之，說的多了，等於白說。人的思想總是逐步受影響的。要“毛毛雨下個不停”，“傾盆大雨”就會發生逕流。政治局是團粒結構不足的，傾盆大雨吸收不了，

順着身子流走了（還是土壤學、農業學都要一本，不然省委書記當不成，有一天總要撤職的，這不是我威脅你們）。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象杜勒斯的聯合國。你給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象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不準備看。

在杭州會議我講的，恩來同志講了沒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象崇拜也好，不管什麼原因，全國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我說了各部門都有對形勢估計不足的情況，軍隊增加了八十萬人，工人學徒增加了一百萬人，反對右傾保守，為什麼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一千五億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反“冒進”就影響了人代會的報告。人心總是不齊的。不平衡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法則。孟夫子說過：“物物不齊，物物惜也”。人心不齊，又可以齊，有曲折，螺旋式的進步。當然大家都是為黨為國，不是為私。

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就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財經部門考證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也不講。要和風細雨，要事先通一點情報。總是傾盆大雨，發生逕流，總不開恩，總沒有准备好，不完全，這就是封鎖，這是斯大林的辦法。開會前十分鐘拿出文件來讓人家通過，不考慮人家的心理狀態。你們是專家，又是紅色，政治局多數人是紅而不

專。我攻擊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長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封鎖的人。小會不解決問題，就開中央全會（文章做好這件事，沒有認真解決，寫給廣西省委一封信，談報紙問題）。我在蘇聯寫回一封信，說你們不得中央的支持，對你們工作不利，不然會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設計院。傾盆大雨在我們身上流走了，老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分散主義有一點，但不嚴重。各有各的心靈狀態，我替你們設想，你們大概有一個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說中的女主角馬哥瑞特，快死了，見愛人還要打扮一番。“飛燕外傳”，趙飛燕病了，不見漢武帝。總之是不願意以不好的面目見人。蓬頭散發見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條寫一條，把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自己將信將疑的東西拿出來，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聖旨”，不講則已，一講就搬不動。四十條就是这样，開始在杭州擬了十一條，天津增到十七條，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條。“寡妇养仔，众人之力”。這是工作方法問題。

我看還得鬧對立的統一，沒有針鋒相對不行。要么你說服我，要么我說服你，要就是中間派。有人就是這樣，大問題不表示態度。馬克思主義不是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嗎？這樣我不理解，應當旗幟鮮明。大概想作楚王，‘三年不鳴，一鳴惊人，三年不飛，一飛升天。’

再一個是頑固（胡××到），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講話做文章，各取所欲，人民日報聞

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談起。二月開始談到，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十一月二中全會，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同志的心。我說十個干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反對，就是不執行。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北京的學校哪個放的開？××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會議上做報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難買的好时机”，“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樣才放開了。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右派高興，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分子。人們都有一種惰性，不容易搞開，××要不是那一次會議，北冰洋的冰是開不了的。××是好人，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再談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財經工作者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只有一個指頭不好，我講過一萬次就是不靈，工作方法需改良一下。我最無學問，什麼委員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談過，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我是老資格嘛！總該給我講一講。我灰心了，這次千里迢迢讓你們到南方來，是總理建議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反了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十多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係，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彩了，又復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个全面反“冒進”，甚麼

“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研究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論，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幅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資产阶级的方法，象陈其通、黃炎培、陈銘樞的方法。

我要爭取講話。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書記會議承認部分錢花的不恰当，未講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說：“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長、省委書記，脱离了六亿人民。請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長得漂亮，会說話，好色。宋玉一一反駁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說登徒子討了一个麻臉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击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們看干部，要看德才資，不能德才都不講，只講資的一部

分。九个指头不說，只說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傾盆大雨，要文风浸潤，不要突然襲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間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將法。

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糧食年度征購九百二十亿斤，多購一百亿斤。講冒进，这一点有冒。鬧得“人人談統購，家家談糧食”。章乃器是糧食部長，他同意这个計劃，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鬧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糧食銷量多，反映了农民沒有勁。江苏反映社長低头，干不下去了。我們就怕六亿人民沒有勁。不是談羣众路綫嗎？六亿人泄气，还有甚么羣众路綫？看問題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中央大权独攬，只攬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間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講卫生，家家講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檢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減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兩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約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使兩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兩個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

廖××告訴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給你們开四次会，檢查十二次。兩本帳，爭取超額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

紅安縣那篇文章，請你們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書記一人买鋤頭，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鋤頭。还有山东莒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八、三十日)

一、八年來第一次在一月討論國家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以後也要每年在這個時候開會。這次人大要開得從容一些。多開小組會，大會可以少開。工作缺點看到的要加以批評。準備工作不太好，一面開，一面準備。文件可以在討論後再修改發表。

二、我們這個民族，七、八年來看來是有希望，特別是去年一年，几億人口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把許多問題搞清楚了，到處發揚了積極性，任務提得更恰當，如十五年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方面趕上英國，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修正重新發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現在也可做到了，過去沒有辦法的事，現在也有辦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觀論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沒有希望，文章在大字。

我們民族在逐漸覺醒。因為覺醒了，才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才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才進行整風、反右派。中國又窮又白，窮就要革命，一張白紙好作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白，他們就是太闊了，包羅甚廣，資產階級思想成堆。

現在生產與我們地位完全不相稱。歷史甚久，但鋼鐵生產比不上比利時，它有七百多萬噸，我們只有五百二十萬噸。羣眾熱情甚好，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趕上英國。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會就在水利、積肥上做了布置。現在羣眾熱潮好象原子能，發出了熱力。十五年後，要搞四千萬噸鋼，五億噸煤，四千萬瓩電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看起來八年可完成。為達到這目的，要有干勁，要鼓起勇氣，力爭上游。

三、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希望總是寄託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

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說過。“偏聽偏信”，不可不偏，我們不能偏聽右派的話，要偏聽社會主義之言。君子羣而不党，沒有此事。孔夫子殺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無常”，是的，我們只能喜好人，當你當了右派時，我們

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輕視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輕視嗎？

四、人多好还是少好？現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时，人們才会紧张。要看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兩種：一种作得比較好些，一种比較差些，也就是兩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鐵，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鳴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来攻我們的，現在在全民中用大鳴大放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絕，象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長也好，总理也好，主席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現。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們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覺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紅安县的干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們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說：“八路軍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長，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負責人除了病老的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經，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量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以少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生产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原料，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都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覺得腦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六、勁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沒有注意，給羣众以挫

折。一个时期一些問題上发生了錯誤，如合作社曾有人說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輪双犁在南方名誉不好，举登徒子好色賦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們的，但好人也有时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識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沒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現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二至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現在是一場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現在我們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要認真学习，搞試驗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勁。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說改造好了，將來还要整。

要講不断革命論。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一九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鐵，中間不使冷場。在这里，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現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績。人的思想是可以变的，作风也可以改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們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繼續，但不要勉強，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

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将会变成“染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结果他们变成了“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是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真话，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话，现在不适用。要逐步做到说真话。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来没有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上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显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没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重考验，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更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鑽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心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他们，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或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间，逐渐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人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三月十日的讲话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

——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

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獨創精神。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我黨從建黨時期到北伐時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雖有陳獨秀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思想，但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三年，我們建了黨，參加党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寧在世，階級鬥爭很尖銳，斯大林尚未上台，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陳獨秀主義來源于国外社會民主黨和國內資產階級。這個時期，雖發生了陳獨秀主義的錯誤，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

內戰時期到遵义會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國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在理論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學派。中國“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有些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只看外國。加上斯大林的統治開始鞏固（大鞏固是在肅反後），共產國際當時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諾維也夫，東方部長是庫西寧，遠東部長是米夫。 $\times \times \times$ 是個好同志，善良，有獨創精神，就是太老實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有些中國同志也受到影響。“左傾”，知識青年中也有。當時毛

明等搞了个所謂“二十八个半布爾什維克”，几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麼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縮小了黨的圈子。

中國的教條主義有中國的特色，表現在戰爭中，表現在富農問題上。因為富農人數很少，決定原則上不動，向富農讓步。但是“左”派不贊成，他們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結果地主沒飯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綠色游击队。在資產階級問題上，他們主張一概打倒，不僅政治上消滅，經濟上也消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對帝國主義也不加分析，認為是鐵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國民黨。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統計工作，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几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制，小學五年一貫制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鷄蛋，不能吃鷄湯，因蘇聯有篇文章說不能吃鷄蛋和鷄湯，後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總之，是蘇聯第一。商業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

教條主義的情況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設計、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中国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會鑑別。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經驗和苏联專家，破中国的旧專家的資產階級思想。苏联的設計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要硬搬。

二、我們对整个經濟情況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現在情況变了，大企业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設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沒有壓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薩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們必須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領導也不成。我們党在历史上就是強調个人作用和

集体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寧，說列寧独裁。列寧回答很干脆：与其讓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賞高崗，專送一輛汽車，高崗每年“八·一五”都給斯大林打賀电。現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華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內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問題。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陸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們就得搬家。輕微的地震是經常会有的，高、饒事件是八級地震……

四、忘記了历史經驗教訓，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經講过，对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一种方案，擇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腦筋，不加比較。过去我們反对教条主义，他們的“布尔什維克”刊物把自己說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噓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實話報》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錯誤，不講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綫，原則和苏联相同，但有我們的一套內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設和經濟建設，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費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費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惧。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个月。对于互相同盟

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态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里，現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後，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接受，不好的應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一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提出了工、農業同時並舉，工業化的道路，合作化，節育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羣衆性的對我們工作的批評，對人民思想的啟發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實改。一個辦法是和羣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則集，能分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後定下來的。分權當然不能是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之前是進步的，到社會主義時期是反動。蘇聯俄羅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數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國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國。

中國的革命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勝利的。假洋鬼子“不許革命”。“七大”提出放手發動羣眾，壯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國。與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开始，

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十綱領。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我們不辯護，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好象又是不真了。這個報告公布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並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資產階級要灭亡，見了蘆葦當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也不是沒有見解的人，如杜勒斯聽到我們的文章，說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結論：中國壞透了，蘇聯還好些。但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總之，基本路線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各國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蘇聯強調一致，不講矛盾，特別是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

三月二十日的講話

我講四個問題：

一、改良農具的羣眾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因為幾億農民在動手動腳，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節省勞動力幾倍，以機械化代替肩挑，就會大大增加勞動效力，由此而進一步機械化。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不可能完全機械化，總有些角落辦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總有些還是半機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業，過幾萬年還會有的，如吃飯，永世手工業。它同機械化是對立的統

一，只是性質不同，应当結合起來。

二、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報，內部可以通報。象土改一樣，開始不要登報，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搶先，會搞得天下大亂，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說河南第一，各省都要爭個第一，那就不好。總有个第一，“狀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載難逢”。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內實現四、五、八，消灭文盲，當然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羣眾過份緊張。我們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兴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只要路線正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幾句話更通俗化），那麼後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能算不榮譽，也許還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緊張的要命，四川的高級化；×××從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並不壞。遲一年有何關係？也許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對。問題是看條件如何，羣眾覺悟提高沒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觀存在的事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兴興的好？十年、八年搞個四十條，那樣搞社會主義也沒有開除黨籍。蘇聯四十年才搞那麼點糧食和東西。假如我們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當然好，也應當如此。因為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也不同，比較生動活潑，列寧主義比較多。而他們把列寧主義一部分喪失了，死氣沉沉。列寧在革命時

期的著作，罵人很凶，但是罵得好，同羣眾通氣，把心交繫羣眾。

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指標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總之，要有具體措施，要務實。務虛也要，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好的，但沒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區兩個月開一次會，檢查總結一次，開几个人或十几個人的小型會。协作區也要二、三個月開一次會。運動變化很大，要互通情報。開會的目的，為了調整生產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與慢的對立的統一。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下，波浪式的前進，這是緩與急的對立的統一，勞與逸的對立的統一。如果只有急和勞，則是片面性。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麼行呀？做事總要有緩急（如武昌縣書記，不看農民情緒，臘月二十九還要修水庫，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戰與休整的統一。從前打仗，兩個戰役之間必須有一個休整，補充和練兵。不可能一個接一個打，打仗也有節奏。中央蘇區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張“勇猛果斷，乘勝直追，直搗南昌”。那怎麼行？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為“緩”，“緩”轉化為“急”，“勞”轉化為“逸”，“逸”轉化為“勞”，休整與苦戰，也是如此。勞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與苦戰也有

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磨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

中世紀的形而上学，中世紀的形而上学轉化为近代的辯証法。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恆的。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沒有質变，那就違背了辯証法。世界沒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現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見古代是很热的，延長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說，延長古代是生長竹子的，現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无限：時間、空間无限。无限是有限構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講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潑一下。腦子一固定，就很危險。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級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統，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經典著作，而要开动腦筋，使思想活潑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設路綫，还在創造中，基本觀點已經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綫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將信將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說他对水利將信將疑，但他对于路綫則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現在逐漸多起来了，連我自己也将信將疑，碰到人就問：“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如此，沒有證明此事就要問。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

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們干部中的一部分）。現在已經使得少数人感覺到这条路綫是正确的，对于我们來說，在理論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績，多数人心情舒暢），承認这条路綫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國，這是理論，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國还是口号，一五六項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計劃搞二千万吨，在我腦筋中存在問題，是好，还是天下大亂？我現在沒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問題就調節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陣，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設工业出了乱子，現在又好了。

路綫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羣众斗争的創造，这是一种規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創造，提出了几条。許多事情是沒有料到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轟轟烈烈，沒有料到出斯大林問題、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誰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現在人們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們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轉化过来，那是另外的問題。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們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們，半心要搞

資本主义。經過整風，已經有了改變，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黨派開自我改造誓師大會，全國都要開）。

第三个是左派，即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其實是四個階級，農民是另一個階級）。

路線已經開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備，尚待証實，不可以說已經最後完成。工人向農民擺闊氣，有些幹部爭名譽、地位，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不把這些問題解決，就搞不好生產，不解決這些相互關係，勞動怎能搞好？過去我們在建設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正確路線是對錯誤路線而言的，二者是對立的統一。正確路線是在同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確，沒有錯誤，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少犯點，犯得小點。正確與錯誤是對立的統一，難免論是正確的。只有正確，沒有錯誤，歷史上沒有這個事實，這就是否認對立統一這個規律，這是形而上学。只是男人沒有女人，否定女人怎麼辦？爭取錯誤犯得最少，這是可能的。錯誤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關係。少犯錯誤是可能的，應該辦到，馬克思、列寧就辦到了。

三月二十二日的講話

無事不登三寶殿，想到一點問題交換意見。

西廂記中，有一段張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飛虎圍着普救寺，張生要送信請他的朋友白馬將軍來解圍，无人送信。開羣眾會議，惠明挺身將信送去。這是描寫惠明勇敢胆大是堅定之人。希望中國要多點惠明，要在縣委委員以上幾十萬人

中發動一下大鳴、大放、大字報批評領導。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氣氛，共產主義的氣氛。羣眾罵你一頓出口氣，並沒砍你的頭，撤你的職，這是蓬勃的戰鬥的情緒，是很高的共產主義的風格。現在羣眾鬥爭的風格很好，我們同志之間也要提倡這種風格。

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領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对立面，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說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

地方工作同志，將來總是要到中央來的。中央工作的人總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魯曉夫是從地方上來的。地方階級鬥爭比較尖銳，更接近自然鬥爭，比較接近羣眾。這是地方同志比較中央同志有利的條件。秦國稱王在後，但是稱帝在先。

要提高風格，講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概。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們的同志現在並不企圖勢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現象，這很不好，是奴隸狀態的表現。象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對於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在這一點上，斯大林比較好一點。聯共黨史結束語說：“馬克思主義個別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變。如一國不能勝利（按：指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內首先取得勝利）。”中國的儒家

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問題。学习馬列主义沒有勢如破竹的风格，那危險。斯大林也称勢如破竹，但有些破爛了。他写的語言学、經濟学、列宁主义基础比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問題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則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時間消耗多少来定工資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財产还存在，小集團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將來要消灭，有始有終。康有为的《大同書》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單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轉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單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費單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撫育成人的單位。教育部門的主要部門，也在学校。总之，將來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東西。現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許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將要消灭。我們許多同志对于这样多問題不敢去設想，思想狹窄得很。这些問題經典著作上已經講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這說明馬列风格高，我們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馬克思主义者恐惧資產阶级知識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謝主龙恩”的

殘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他們自然科学可能多學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見得。他們讀馬列主义比我們多，但讀不进去，懂不了。如吳景超讀了很多書，一有机会就反馬克思主义。

不要“自慚形穢”。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諾夫，馬列主义比我們讀得多，但他們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資產阶级的仆从。

現在情况已有轉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許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綫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訓傳》、《紅樓夢》、丁玲等。本来，消灭資產阶级的基本觀點，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經常講革命分兩個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們是不断革命論者，但許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視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誕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產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組。

王明、陳獨秀是一样的。陳獨秀是主張讓資產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讓資產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壯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陳獨秀不是馬列主义者，而是資產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經過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馮雪鋒，好人如×××。完全是資產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講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銳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讓干部看，裝穷，无人时，才向貨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貧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

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認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請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針作对。他沒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現在被說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創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學問？釋迦牟尼十九岁創佛教，學問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學問？不过高中程度。馬克思开始創立辯証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后来学来的。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經形成了。在开始著書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資產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亞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滿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腦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顏淵（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紀不甚大，學問不甚多，問題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輕的。年輕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們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們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學問。刊物出后，方向不錯，就对了。雷海宗讀了本馬列主义不如我們，因为我們是相信馬列主义，他越讀得多还当右派。現在我們要办刊物，要压倒資產阶级知識分子。我們只要讀十几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們去看經

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書，尽講抽象不算紅。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們去組織，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自古以来，創新学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學問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們的。馬丁·路德創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藥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藥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藥。據說盤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蘭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傳記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讀了兩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說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學問是抓来的。从来創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視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嗎？我們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廿多岁，而那时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評得尖銳、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們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講真心話。

王鶴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評教条主义，彭濤的也好，有說服力。尖銳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別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錯誤思想，提高

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錯誤中也包含自己的錯誤）。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說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鐵路要說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別人吓倒了。張奚若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們愛每一分鐘。孔子“三日无君則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們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嗎？我們搞平均先进定額，不是急功近利嗎？不鄙視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們干什么？我們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們錯誤是有，主觀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是正确的。天津、南京兩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說話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說，背后唧唧咕咕，这就不好。應該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銳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銳鮮明，橫豎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銳的批評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話不說，就很危險。当然，說話要選擇时机，不講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賢的那样不講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楊慎安被充軍到云南。历史上講真話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賈誼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則而斗争的。不敢講話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

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紅尘，什么都不怕了。沒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講話。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們的嘴巴嗎？我們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說話，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說：“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羣众來說是对的。先进分子應該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副，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

我們应当领导羣众。現在羣众比我們先进，他們敢于貼大字报批評我們。当然和儲安平不同，那是敌人罵我們，現在是同志之間的批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話不敢講，只講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現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里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兩头小，中間大。一九五六年有許多問題，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就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計是不是对？

这次會議解决了一批問題，取得協議，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談得較少，是否用兩、三天的时间談談思想問題，談談心里話？

同志們說这次會議是整风會議，又不談思想，实践諾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細雨，把心里話講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象马克思、魯迅那样。敢說，要把顧慮解除。在地委書記約在兩、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鄧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軍》，直接罵皇帝。章太炎写

文章駁康有為也是精神百倍。年紀越大用處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點勁。當然，年紀大的也還要，也要掌舵。三國時刘备不好，還是老頭子掛帥。要衝破黨內的沉悶氣氛。

印了一些詩，盡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後，搜集點民歌。各個階層、青年、小孩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驗，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搜集，會收到大批舊民歌，下次會印一本出來。

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在的新詩不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首乃至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

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怎樣？

兩條道路鬥爭，恐怕不會有幾個回合。我們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是不會出來的。我在成都會議上說過的，國內有四個階級，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余，三十萬右派也包括進去。地主現在

分化了，有改造過來的，有沒有改造過來的。沒有改造過來的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堅決反共，就是現在的蔣介石、國民黨，是敵對階級，如章伯鈞等。黨內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樣的，包括一些現在劃為中間偏右還沒有触动過的右派。捉住沒有划，或沒捉住的也屬此類。這些人加起來大約佔人口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較恰當。這是敵對階級，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來，就是大勝利。要調動他們，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能把它中十分之一改造過來就是成功。几年之後，他們把心交出來，真正改變，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轉左，或轉成中間；左也可能轉為右，如考茨基。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如劉紹棠、陳伯華；農村富裕中農也包括在內）他們在性質上屬於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大多數是中間分子，他們是剝削者，與前一個剝削階級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個動搖的階級。他們反共，但不堅決，與蔣介石不同；看誰力量大，就跟誰走。漢口有個資本家，從漢口到北京，就靠“擁護共產黨，擁護公方代表”這句話吃飯，多一句也不講，實際上思想沒有多大改變。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台，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干。這些人對共產黨是兩條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無心無意的。經過去年一年到現在的鬥爭，這些人政治上正在發生着變化，但仍然是半條心。去年這些人多數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經過大鳴大放，農村、城市整風一勝利，一年生產的大躍進，形勢逼人，他們就不能不有所改變。能不能三七開，請大家考慮。形勢是人造的。人

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長江大橋、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較文明一点，我們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採取批評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採取帶点武的性質，无非是把他們搞臭。这两个剥削阶级，我們的方針也不同，我們是團結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團結中間派，孤立右派。

地、富、反、坏、右他們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們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講話，講透一些。首先一訓，然后一拉。訓則凄凄慘慘，冷冷清清，拉則全身热，通身舒暢，指明前途，使他們有希望。象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錢一样，开始鳳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鳳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說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沒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們党的領導下，做工、种田，我們在相互关系問題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們干部的作风，一般說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則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說服。湖南医院有一个女干部霸佔一个厕所，不許別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們看作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觀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說話，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混，誰敢貼大字报？大鳴、大放、大整、大改一來，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評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洗澡工人說自己不應該增加工資。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員就板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紅安縣干部，老爷气一經改变，与羣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問題，我們抓中間，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們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問題。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氣。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員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員与下級的关系，干部和羣众的关系，校長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話，是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蓋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寧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寧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应当很好讀一讀。他說理，生动活潑，把心交給人民，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讀書，辯証法不甚通，唯物論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沒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們是父子、貓鼠关系，思想僵化，現在好了一些了。我們的民主傳統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一无錢，二无糧，三无枪，四孤立无援，沒有别的办法，必須依靠羣众，党必須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須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須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內廢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經常教育，經常作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時間長，在斗争中鍛煉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贊成

对羣众採取說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說，五七年春季右傾了，只贊成夏季形勢，不贊成春季形勢。其实夏季形勢也是不贊成的。夏季形勢一文就說過，軍隊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見這問題還沒有解決。經过去年整風，特別是今年丰收，再苦戰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變落后面貌，那时候人們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作工作，寫文章，用理論說服這些人。我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百分之五的細菌（敵對階級）還是會有的，中間派也可能變壞，他們肚子里是有意見的，不過嘴巴暫時不說，將來還要說的。鬥爭是長期的；反復的，複雜的，要記住。但是，階級鬥爭的基本戰役已經打過了，勝利我們已基本取得。几億人民蓬蓬勃勃起來了。右派孤立了，三十萬右派搞臭，沒有資本。民族資產階級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對知識分子戴上了兩個帽子，封了他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封他們迷失方向。他們中的左派、右派都出了些領袖人物。出英雄是左派，是我們這些人。將來犯錯誤的人，也會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資本。一不小心就會犯錯誤，如××××是四十年的政治局委員，脫離羣眾，一個工廠不去，一個農村不去。××××的好處，就是下去到處跑，人家說他是旅行家。我看當旅行家也有好處，過去我們打游击，就是旅行家，旅行了幾十年，現在還是南方旅行到北方，還要當旅行家。中央和省兩級規定，四個月當旅行家，地、縣要更多。要用辦法把他們趕出大門當旅行家。

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計反復，階級鬥爭還會反復。如果世界上出了大事，中國出了大問題，世界大戰，大災荒，右派還會造反的，中間派還會起來反對我們

的，但是基本戰役已經过去了，形勢是好的，但要準備壞的。

總之，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破除迷信，不要以為只有外國人才能學會。洋人沒有什么了不起，外國人看我們也是洋人，月球上看我們也是神仙，相信我們自己可以學好的。酒色財氣一股氣，氣是統帥思想，財是國家財產，色是生下后代，酒是生產糧食。要有思想準備，壞事情會出現的，一個省，二、三、四萬人鬧事是可能的。要破除迷信，對科學家要相信又不相信。從古以來一般兒子比老子強，學生比先生強，年輕人比老人強，看殘人比演員強。凡講問題都要講點思想，有些同志說話就講數學，不講思想不大好，不要象蘇聯院士不注意人民內部矛盾。

孫行者是無法無天，大家為什么不學習他呢？孫行者反教條主義敢作敢為，猪八戒是自由主義，但有修正主義，老想退伍。當然那個黨不好，是第二國際，唐僧相當于伯恩斯坦。

省以上的人代會、黨代會都可以貼大字報。我們黨內懷疑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人不少。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工人、農民、共產黨內部、領導與被領導者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除右派、反革命外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不下廠、不下田、作风不好等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大字報萬里長江滾滾來，便把好多人的頭腦中的渣子沖掉了。

蛇不讓它出來怎么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然後讓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認識他了。我們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鄉里斗，好辦事。整風開始我們發了指示，只是少數人知道，多數人沒有發，看下級干部黨員動不動腦筋，是什么態度。

關於技術革命問題。技術革命是逼出來的，××問題帝

国主义都是逼出来的。有对立物就会逼出来（拷红娘，一打就說出好多道理。）世界上好多事情是逼出来的。研究問題要用观点指揮材料，用政治带动业务。談工作面貌不要倾盆大雨，要毛毛雨。只談數目字，政治都沒有，哪有水平呢？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統帥。今年开个報紙会。我們不怕发动羣众，发动羣众才是真正的馬列主义作风。列宁下乡、下厂接近羣众，对官僚主义罵的很兇。

整风要划清敌我界限。人民政府对人民是民主的，对敌人实行專政。整风沒有內外夾击整不好。但要分清敌我，对敌人要專政，对人民要說服。整风、反右派在許多地方、單位帶有重新夺取政权的性質。一个阶级內部有許多阶层，問題复杂。如农民中有中貧之分，工人有新老之分。上下关系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与人民是敌我矛盾。經過整风和反右派，政治上扎穩了根子，干部和羣众都有了經驗，分清了兩类矛盾。

浙江有个县，右派搞活动，无羣众，失敗了。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第一次 講 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我講一講破除迷信。剛才不是有同志講破除迷信嗎？我們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得沒有那么样厉害了，有的人已經接

受了大学教授的聘書。我在报上看到了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書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現。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講怕資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說，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議上講过，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腦子，跟我們差不多。不过他腦子里有一大堆馬克思主義。他写了不少的書給我們看。我們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沒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樓上去了，我沒有看完，还在樓底下。我們沒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讀完，讀一部份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們做的超过了馬克思。列寧說的、做的許多地方都超过了馬克思。馬克思沒有做十月革命，列寧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馬克思沒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們的实践也超过了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馬克思革命沒革成，我們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論。

我們理論水平不高，現在不高，但不要怕，只要努力就能上去的。楼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还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談，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傳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一百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又宣傳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覺得自己不行。对孔夫子說来，我們也不行。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国人說来，我們不行，我們怕外国人。从前怕孔夫子。董老，你不是服从过孔夫子嗎？这是

什么道理？那时是：“非圣即違法”。反对圣人，就是違反宪法。对外国人說，我不成，对孔夫子說，我不成，这是什么道理？我問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們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們大家都搖头說，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說，不，我們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別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別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一看我們，不就是在天上了嗎？所以我說，我們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問他們，我們算不算神仙？他們說不算。我說，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們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別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不是把我們看成神仙嗎？第三，問他們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們說，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說，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們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嗎？這說明在这点上是有迷信思想。

有一种微生物叫細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來說，他比人厉害。它不講迷信，干勁十足，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誰，它都要鑽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創立新学派，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學問比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人都后来才变成壯年、老年，學問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是不是一个普遍規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調查研究。但是，可以說多数如此。他們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們方向对。學問再多，方向不对，

等于无用。“人怕出名猪怕肥”，名家往往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創造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們已經成了名，年纪大了，有了地位了，不受压迫了，忙得很，就不去研究學問了。当然，不能全盤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候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十二岁当丞相，他才是个“紅領巾”，他的祖父甘茂沒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大問題。

汉朝有个賈誼，十七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長沙，他写了兩篇賦：《吊屈原賦》和《鵬鳥賦》，又回到朝廷，写了兩本書叫做《治安策》和《過秦論》。我看他也是古时的秦汉史專家。范文瀾同志在場不在場？对不对，请你去考証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兩篇文学作品（兩篇賦）和兩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過秦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汉朝刘邦年纪比較大，項羽二十四岁起兵，五年为諸侯，后来，自立为西楚霸王，死时才三十二岁。霸王別姬应当是在青年时候，現在唱戏扮相不对，給霸王掛胡子，我看不对，應該扮小生。

韓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受过“跨下之辱”。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沒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給人家喊礼，后来教書。他虽然做过官，在魯国当过司法部長，也是短期的，魯国不过几十万人口，只頂上我們一个县那么大，他那个司法部長只頂得上我們县政府一

个科長。他还当过管錢的小官，相当於我們农业社的會計，但他学了很多本領。

顏淵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三等聖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时候，也是青年时候的事，不过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西廂記》里的紅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敢于冲破老規矩，帮崔鶯鶯、張生那么大的忙，当时是不符合宪法的，是違反婚姻法的。老夫人打她四十大板来个拷紅娘，但她不服，講理，把老夫人責備了一頓。究竟是老夫人學問好，还是紅娘學問好呢？誰有創造？紅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南北朝时候有个荀灌娘（河南临颍县人），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頂多只是初中一年級学生。她和父亲被困在襄陽的时候，敢帶几十个人杀出重圍，到長沙搬兵，你看她有多大本事！

唐朝詩人李賀死时才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时才十八岁，作皇帝时只二十六岁。李賀、李世民都是貴族出身。

唐末山东历城人罗士信，也是二十四岁起兵，十四岁就跟人家打仗，很勇敢。还有杜伏威（山东章邱人），十六岁就当了大將。

作《騰王閣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青人，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

宋朝的名將岳飛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瀾同志，你說对不对？你是历史家，說的不对，你

可要糾正。

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壯年、老年的时候創造出来的，而是青年的时候創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才二十九岁。

列寧也是卅一岁（一九〇三年）創造布尔什維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輕人。孔明二十七岁当軍師。孙吳原来的統帥程普是个老將，但孙吳打曹操却用周瑜掛帥，他为左將軍，程普为右將軍，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有个黃蓋，是我的老乡，湖南澧陵人，他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的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晉朝的王弼，作《庄子》和《易經》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肅，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藥的不是什么專家，据說是法国的一个小藥房的司藥，我在一本小冊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藥，在作試驗的时候，几乎喪失生命。試驗成功了，法国不贊成他，說他犯法，德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給他开庆祝会，給他出書。

盤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是一个染匠，因为他的女儿害病，无錢进医院，就在染缸里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經過化驗，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盤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年轻的人。这人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輕視。他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亞洲都跑到了，就是沒有到过上海。

最近，胡适回到台灣，搞科学院，选院士，把在美国的兩個发明家李政道、楊振宁也选上了。这两个人也是青年。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創造了先

进的紗紗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輕人。

“哪咤”——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个年轻，他的本領可不小呀！

南北朝的蘭陵王也是年轻，他很会打仗，很勇敢。有一个專門歌頌他的曲子，叫《蘭陵王入陣曲》。據說这个曲子現在在日本。

现在的許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总之有为的年轻人很多。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說明，年轻要胜过老人，学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学問多的人。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不要被名人、大学家吓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創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們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認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認為“搞工业化不容易呵”，总之，認為搞工业有很大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談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們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要先藐视它，然后重視它。

“讓高山低头，要河水讓路”，这句話很好。高山嘛，

我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們要你讓路，你还敢不讓路！

这样設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們不是狂人，我們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馬克思主义者。

不要大國沙文主义。大國沙文主义是丑惡的行为，是低級趣味。

《法門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賈桂，他是刘瑾手下的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內閣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賈桂坐下，賈桂說，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賈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腦筋，中国古詩中有一种抑古詩，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什么独創风格，要去摸抑別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斯坦，从资产阶级老师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質，而不是皮毛。比方說，莫斯科的九条共同綱領（《再論》說的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不結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沒有特別強調那一个地方的經驗，就是怕

照抄。現在在工作中也要注意這個問題。

修正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化了的人，抄資產階級。鉄托抄伯恩斯坦就是一例。

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于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于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列寧向第二國際標新立異，另插紅旗，是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產階級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讓它有空白點。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列寧說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這是真理，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們先進，西歐落後。

我們藐視資產階級，藐視神仙，藐視上帝，但是不能藐視小國，不藐視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後，我們變成現代化、工業化、文化高的大強國，可能要翹尾巴。我們不要怕。現在就講清楚，狗翹尾巴，不一定要打棒子，澆一瓢冷水就行了。我們有的時候是要澆一澆冷水的。

不正當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虛偽的自信心，都是不能允許的。不建立在科學上的謙虛不叫謙虛。真正的謙虛要合乎實際。比如說，我們見了外國人，說中國現在還是農業國，工業建設才開始……這就是實際，但外國人說我們謙虛。一般的是合乎實際為謙虛。也有些謙虛低於實際，過分謙虛。一般是合乎實際的，為謙虛。

這種說法，類似魯迅對於諷刺的說法。魯迅說：用精煉的或者有些夸張的筆墨寫出真實的事物，就叫諷刺。

范文瀾同志最近寫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興，這是站起來講話了。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們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对，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够，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臘的辯証法，中世紀的形而上學，文艺復興，這是否定的否定。

中國也是如此，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這是辯証法。封建時代的經學，這是形而上學。現在又講辯証法。

是不是？范文瀾同志，你對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後，尾巴肯定要翹起來，要出大國沙文主義。出了大國沙文主義也不怕。難道怕變成大國沙文主義就不為建成社會主義大國而奮鬥嗎？即使將來出現了大國沙文主義，也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有一種正確的東西要代替大國沙文主義的，有什么可怕？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變成大國沙文主義。列寧的辯証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學，現在的辯証法，這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學，他懂得辯証法，但是不很懂。人民羣眾的創造性，是客觀存在。設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觀存在的。如我們對於右派，讓他放，讓他講，

这是有計劃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設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視整改，又強調了大字报双反，这样設置了对立面，出一亿張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設置对立面，不是說客觀上不存在而去設置。所謂对立面，是要客觀存在的东西才能設置起来，客觀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設置不了的。

我講完了，这个題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馬克思。

第二 次 講 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一) 国际形势

資本主义世界乱子很多。我們这个世界乱子比較少。我們團結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們的陣營，它不算。不是我們不要，是它自己不干。我們的陣營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的，沒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烏云。有的人認為我們不行，人家行。我說我們行。我在莫斯科會議上講了十条証據，證明我們从来就行。蔣介石在南京，我們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內。南京有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蔣介石手里。他有几百万军队，我們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強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強的沒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蔣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話下。我們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紙老虎。美帝

國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話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說，很慚愧，过去打过你們。我說你們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們的侵略，占領了大半个中国，使我們團結起来，領導全国人民打走了你們，来到了北京。我們在延安时說，那一年我們才能看到梅蘭芳、程硯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輩子看不到。可是，我們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七年来，全党團結，就推翻了蔣介石。現在又要團結起来搞建設。“七大”有个綱領。这次會議也是團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綱領，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線，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線。全党團結，全国人民的團結，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內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亞、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資本主义世界。但對我們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對我們有利。帝国主义內部吵架，他們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爭奪阿尔及利亞（不詳講，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烏云，这种时候我們要有远見，不要被暫時的黑暗所迷惑，以為我們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沒有那个事！我們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長征，前堵后追，軍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鍛煉，以后新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頁，就講这个由小到大的辯証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組，发展成为领导苏联的大

党。他們当时一枝枪也没有，而他們的敌人先是沙俄，后来是克倫斯基政府，都是全副武装的。是全副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說那个强？我說是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們党的情况也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沒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書記。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熟，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錯誤。想一想我們党的历史，我們經過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長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沒有几个人了。危及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長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經過了分裂，以后又团结。張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人包围我們，將我們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強，还是南京強些？我們強些，还是蒋介石強些？現在証明是我們強，不然为什么現在我們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灣呢？是誰胜利了？

（二）國內形勢

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講国际形势就要講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証明劳动人民被压迫，有生命力。現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們的同盟軍，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他們后方有我們的同盟軍。我們繞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寧說：“先进到亞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

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們先进还是我們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同志率领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賀中国將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說：“这杯酒我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們是学生，我們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說：“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爭气。这說明不仅列寧，連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強。我們不要狂妄，把尾巴翹到天上去，也不要自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說、敢做，基础是馬列主义。鐵托也敢想、敢說、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資本主义，而不是馬列主义。我們的基础是馬列主义，因此我們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說、敢做，是不会出亂子的。

講講国内問題。国内問題还是一个农民同盟軍的問題。中国革命始終是农民同盟軍問題。工人阶级假如沒有农民同盟軍，就不能得到胜利解放，就不能建設強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手工业除外），現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兩倍，連家屬在內也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則有五亿多。中国的問題始終是农民同盟軍問題。有些同志对这方面問題不清楚，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錯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問題上。对农民思想感情不太懂，因此沒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們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書，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九个合作社的資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沒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

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合作社的資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能不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些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太妙，三、四个人往耳朵里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省作过一个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食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的人吗？问题是看你站在那个立场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一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一农立场上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有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

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要注意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而不实，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像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各业各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出来，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子扎在脑子里，不然，总不深。扎根串连就扎这个根。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一十二万亩土地全部深耕一遍，

深翻一尺五寸，爭取畝產九百斤。這就提出一個新問題，各縣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長葛縣能做到，別的縣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總可以翻一次吧？我看五年總可以！他們第二個五年計劃把全縣所有土地都翻一遍。沒有好工具，就用長葛縣那樣的工具，用他們那種辦法。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沒有別的辦法，就用他們的辦法。也許還有別的辦法。他們的辦法是：先把表層熟土翻在一邊，然後把肥料埋在生土上，再用鐵鋤把二層生土翻開，與肥料攪拌，打碎坷垃後，仍放在下層不動，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層土不變，這是一大發明。深翻一遍，增產一倍，至少增產百分之幾十。增產的措施，土壤應當放在前邊。水、肥、土、種子，還有密植要單算一項。要合理密植，廣東一畝要搞三萬株，每株插三根秧，每根秧發三根苗，結二十七萬個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萬粒。二萬粒一斤，一畝八百一十斤。畝產八百斤不就算出來了嗎？北方的小麥、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這樣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們都不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變成碳水化合物，經過光合作用製造植物需要的東西。碳水化合物等於二氧化碳加陽光。糧食是熱能儲藏庫。每個團粒結構都是个小水庫。這扯遠了，主要講扎根串連，研究幾個合作社，幾個工廠，軍隊搞幾個連隊，教育搞幾個學校，商業搞幾個商店，不要多了。總之，各行各業都要搞幾個，抓幾只麻雀，然後腦子里才有深刻的印像。要尊重唯物辯証法，首先要尊重唯物

論。為什麼要尊重唯物論？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這三個東西是一個東西。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生下來就有，還是觀察實踐之後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賦的，是後來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見狗，看見人、小孩、樹木、馬、石頭等，概念初步形成之後，才可推理論判。問三歲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就是小孩的判斷。媽媽是個別的，人是一般的，這裏有同一性。這是个別與普遍的對立統一。這就是辯証法。所以說，三歲小孩懂得矛盾統一，懂得辯証法。我們的思想只能由客觀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觀實踐所形成。概念是從哪裏來的？是客觀世界來的。現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積累了許多經驗才形成的，中國的經驗，蘇聯的經驗，根據地的經驗，幾年建設的經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兩句也是非要不可的，沒有這個不成。一個人、一羣人、一個黨，沒有勁，勁不足，就不好辦事。上游當然要爭，力爭到四川，不爭下游，下游是江蘇。這是借自然地理來談問題。要向先進看齊。

我們的同志要和羣眾聯繫，要真正懂得羣眾的感情，要使羣眾的思想感情深入到我們的腦筋中來。羣眾的感情不深入我們的腦子，就容易動搖。深入了，工作上有問題，就有办法對付了。過去我們打仗也常遇到困難問題，到半夜十二點還無办法，睡一覺第二天办法就出來了。經常有困難的事，不容易的事。孫中山說積了四十年的經驗，我們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深知凡遇到困難的事，就和羣眾商量一下，睡一覺，開個會，就可以解決問題。現在沒有問題，沒有困難嗎？不要為一時的黑暗所吓倒。我們經常有兩個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現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說河北

同志不发愁，他們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加到五十亿斤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点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狮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一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行。要又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行。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有

民主，有集中，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要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是不好的，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还是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当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否認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說完全适合不是沒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說斯大林沒有辩证法，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以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种方法呢？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馬列主义。比如阶级斗争，我们采用了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論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說，革命后的改革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改革。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搞和平土改，沒有斗地主，沒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对资本家做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設，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指示命令、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叫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沒有阶级斗争，不斗地主，不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們比苏联的建設速度更快？……因為我們条件不同：六亿人民，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的快一些。我們將十月革命的傳統，列寧的羣眾路線加以發揮，依靠羣眾，在农村依靠貧农，不过他沒有這句話。

昨天有一位同志說，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錯。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胡里胡涂地跟。我們跟馬克思，跟列寧，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們合作化就是跟貧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羣眾中出現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个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險，要独立思考。

我們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楚，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內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錯誤，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

我們同志犯錯誤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講×××。×××、×××、××、×××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講×××？浙江講×××也講少了。要獻寶，讓大家見識見識，为啥不講？他們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是十个黑指头，×××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現在講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現在又看清楚了。他們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錯誤，但他們积极。他們怕大鳴大放，怕

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們的錯誤只有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島會議文件上就講了保护干部的問題，以前也講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資产阶级中間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与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資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指头与四个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腦筋，一下洗不干淨，需要几次反复。資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沒有，小的可能……資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級台风面前，我們有些同志还会动摇。有了去年这一年經驗，全党經歷了一次鍛煉，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釣魚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們的船沒有翻。有人說《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不写，有些左派也要爛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員中搞出十几万右派，佔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們还猖狂进攻。你說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溫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記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問題，不从本質看問題，要从中吸取教訓。

（四）准备最后灾难

現在講点黑暗。要准备大災大難。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瘋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扳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們搞的好，不会分裂。这是說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說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嗎？……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現在爭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陣營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們強大的同盟軍。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 資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民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瘋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經濟危机。現在打原子弹，时期会縮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講講這個問題 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來建設，从此就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要睡覺。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過，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兩晉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断断續續几百年，三国兩晉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兩千万，以后到唐玄宗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祿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兩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統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講过，我說現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長的大刀厉害，他不信。兩次世界大战死人並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二千万，我們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哪！原子弹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計劃就发展起来，換來了一个資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那样不顧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現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中央委員

更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要跌跟斗。……凡不顧大局鬧分裂的，有什么好結果？張國燾鬧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鬧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象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寧才和他們絕裂。我們要作合法斗争，爭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顧大局。

我們是要調動六亿人民的力量，連右派我們都要做工作，分化他們，使右派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改好。經過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們方面。摘掉右派帽子，再搞右派，再給他戴上。

第三次講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一) 再講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搞了四十一个发明家的小傳，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貧苦的或工人出身，或农民出身的。瓦特就是工人。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紀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除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門都可以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 再講講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的問題。这个問題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資格吃飯，特別是做了大官的，